

目錄 Contents
05 | 2013

- 微博改變中國 / 王君超 p. 2-4
- 獨立媒體分進合擊 競合大眾媒體 / 陳順孝 p. 5-7
- 荒謬的國度—內地採訪的慨嘆 / 劉振瑛 p. 8-9
- 廬山地震採訪手記 / 周文泰 p. 10-11
- 傳播書刊介紹：《出大事了— 新媒體時代的突發公共事件與公民行動》
/ 王睿 p. 12
- Adventures in Skype: University without Walls**
/ Amy Wu, Ava Thompson Greenwell p. 13-15
- 關於「新媒體識讀寫」的二三事 / 葉智仁 p. 16-17
- 四月傳媒記事簿 p. 18-19
- 傳媒參考資料 p. 20

www.rthk.hk/mediadigest

《傳媒透視》網上版提供分類搜索及各期文章閱覽

MEDIA DIGEST online version provides category search and archive of all articles



《傳媒透視》由香港電台出版，機構傳訊組編製。查詢及來稿，請聯絡執行編輯張玲玲小姐。

MEDIA DIGEST is published by RTHK and produced by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Unit.

Enquiries and contribution, please contact Managing Editor Ms Mayella Cheung.

電話/Tel: (852) 27941677 傳真/Fax: (852) 23384151 電郵/Email: cheungll@rthk.hk

微博改變中國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 在《力量轉移》一書中，用「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一詞，說明電視在東歐巨變、馬科斯倒台中所起到的顛覆作用。他指出：「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正在爆發的新的傳播媒介亦或是舊媒介花樣翻新的使用，都是對國家權力（有時是推翻）的挑戰。」他還引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媒介專家威廉斯·亞當斯教授的話說：「菲律賓所發生的一切是通過向新式革命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這是一種通過媒介和符號而進行的革命」。

在該書中，他雖然未給「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但是通過以上闡述，可知它是指那些擁有廣泛受眾和較強的公信力，在歷史變動的關鍵時刻具有顛覆力量的大眾傳播媒介。

微博—顛覆性媒介？

如果阿爾文·托夫勒再版該書，電視這一「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之威名可能會讓位於微博 (Micro Blogging)。全球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認為：「在美國人看來，推特和 YouTube 是個人自由問題，而在其他一些國家來看，它們都是攻擊手段。」推特的這種「顛覆性」力量，已經在「阿拉伯之春」等其他的政治活動中扮演關鍵角色。在「顏色革命」中，伊朗「綠色革命」的參與者用推特進行了直播，成為號召性的力量；2009年5月8日，《獨立莫爾達瓦報》使用了「Twitter 革命」一詞，認為索羅斯利用推特等網站，在該國製造動亂。2009年4月7日，美國的《外交政策》發表莫羅梭夫的文章《譯文：莫爾達瓦顏色革命中推特的作用的更多分析》，稱美國「在國外的莫爾達瓦人從遠端對參與抗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方式就是通過推特保持即時關注。」

推特的這種「軟實力」，令美國政府感到頗為受用。2009年6月18日，美國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直言，推特等社交媒體網路是美國「極為重要的戰略資產」，因為「這些新科技讓獨裁政府難以控制

資訊」。

儘管推特在中國內地被過濾，但是網民通過電子郵件和翻牆軟體，仍然可以及時瞭解到推特上的最新資訊。據新加坡早報網媒體報導：「2009年7月5日，中國新疆發生多年最嚴重的流血暴動，Twitter 的優勢再次發揮得淋漓盡致。當官方媒體的報導只有寥寥幾行字的時候，網友自發收集到的照片、手機拍下的視頻、事件程序記錄已經在網上狂轉」。¹

在中國內地，特殊網路環境使得微博 (Weibo) 誕生，就成為中文世界最為流行的溝通工具，同時也所以被稱為「中國的推特」。

曾長期報導中國事務的英國記者 Jasper Becker 2012年為《改變媒體 改變中國》(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一書所寫的書評中說：「我們反覆地被告知，新科技將摧毀共產黨審查和控制媒體的能力；這話我們至今已足足聽了30年。最初是傳真機的普及，最近是推特和微博 (Weibo) 的流行。」可見，在一些「中國觀察家」那裡，微博被視為中國當下最具有顛覆性力量的媒介。

微博的「顛覆性」除了上文所述，還表現在技術創新和傳播模式上。筆者曾於2011年撰文，借用創新大師克萊頓·克裡斯坦森 (Clayton Christensen) 提出的「顛覆性創新」的概念，分析微博的技術特性和傳播模式。微博基於 Web2.0 的特點和「即時網路」技術，開發出比博客 (Blog) 門檻更低、功能更強，但操作更簡單的互動分享平臺。該平臺以人為維度，以「使用者創造內容」為特色，由海量用戶同時在線生產、分享和評論海量的「微文本」內容，完全符合保羅·萊文森 (Paul Levinson) 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 的概念。

微博在傳播模式方面的革命性，即李開復所說的「基於信任的『病毒傳播』模式」。² 這種傳播方式，通過關係橋 (bridge)、節點 (node)、線 (line)、結構洞 (structural hole) 形成了以中心性 (centrality) 為主的傳播網路，通過戶與粉絲、粉絲與粉絲之間的不同

¹ 韓詠：《新疆暴亂 微博爆紅》：<http://www.zaobao.com/special/feature/pages/feature090712.shtml>

層級的「強關係」和「弱關係」連結，整合了口碑傳播、組織傳播等模式，達到了信息的裂變效果。加上微博以開放應用程式設計介面的形式，兼容大量的第三方軟件，擴大了傳播效果，顛覆了以往的新媒體傳播模式。

作為「建設性媒介」的微博

微博已成為流行於中國內地的一種虛擬生活方式。在一些微博用戶看來，「自由平等太虛，金錢帥哥太實。不如微博，雖是口水，也有思想；儘管唾沫，也有溫良；只是圍觀，也有力量！」（引自@深大丁未的微博介紹）。誠如人民網的輿情監測負責人祝華新的所說：「微博已經成為社會運轉的基本元素，像空氣和陽光一樣」。³

儘管微博在一定意義上被稱為「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但它同時也堪稱「建設性的傳播媒介」。其「建設性」的最重要體現，不僅在於建構了一種「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背景之下的別樣個人生活，更重要的是通過微博，可以張揚普通人的表達權，形成對話以致達成共識，從而起到促進民主社會建設的作用。

（一）微博是對社會資本的建構

作為資本的一種形式，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通過社會網路動員資源或能力的總和。微博具有網路社區屬性，「關係為王」和「內容為王」的規律在微博平臺上同時發揮作用。2010年，Facebook的官方博客發表艾唐·巴克什（Eytan Bakshy）的研究報告，證實了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1973年提出的「弱連帶的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認為「儘管一個人更有可能分享來自密友的單條資訊，但弱關係的集合卻肩負了多數資訊傳播職責。」「我們消費並分享的大量資訊都是來自不同觀點的人。」

在 微博 女王 姚晨 的 4580 萬 粉絲（followers）中，絕大部分是「弱關係」，因為其關注的對象只有 588 人，這些人中也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她的「強關係」。但正是大量的弱

關係「求關注」、「求轉發」，使她能動員數千萬的粉絲資源關注某一話題，為弱勢群體代言。

在新浪微博上，這種利用「微力量」動員網路資源服務社會的做法被稱為「微公益」。除了學者于建嶸發起的「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媒體人鄧飛發起的「免費午餐計畫」影響較大外，還有趙薇等明星轉發、10 萬微博用戶接力，「四歲大肚女童被微博改變命運」等公益事業，使許多「不可能成為可能」。因此，「神奇的微博」成為億萬人構建愛心與和諧社會的公益平臺。



（二）微博是對公民媒體話語方式的建構

除非加上被稱為「長微博」的圖片形式的附件，微博（Weibo）內容短小精悍，一般不超過 140 個漢字，因此便於資訊的即時互動與分享。在《微博力》（Twitterville）一書的作者謝爾·以色列（Shel Israel）看來，微博客的主帖與跟貼的互動是一種「交談」，「這種交談猶如一條河流那樣自然流淌，不久之後，它就被人們稱為「推特流」（tweet stream）」。丹·吉摩爾（Dan Gillmor）認為，傳統的新聞媒體「把新聞視為演說」，「告訴你新聞是什麼」，資訊的流向是從上到下，話語方式是「告知」；而微博的資訊流向是從邊緣流向中心，話語方式是平民式、探討式、情緒化的，在親和力與貼近性方面都要勝出一籌。在評論方面，微博催生出一種觸及時弊、微言大義的「微評論」文體。這種獨特的「公民媒體」話語方式，體現了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所謂「李普曼式的『告知新聞』到杜威式的『對話新聞』的轉向」。微博建構的話語方式，直接影響了傳統的主流媒體的話語方式，同時催生出一種簡明、扼要、時效性更強的「微博新聞」。《北京日報》還將寫作「微博新聞」作為 2013 年招聘考試的題目。

² 李開復：《微博改變一切》，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60頁，2011

³ <http://www.dw.de/公民社会在逐渐改变中国/a-16794314>

（三）微博是對輿論監督的建構

2012年以來，中國的網路反腐出現高峰。僅在2012年下半年，就有重慶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陝西省安監局長楊達才、湖北神農架就業局長劉運山等重量級的官員在網路曝光後被撤職或免職。2013年3月，原任陝西省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副行長、被稱為「房姐」的龔愛愛，也因網路舉報擁有大量房產和偽造公文和身份證件，而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微博由於線上人數眾多、傳播資訊迅速，容易形成輿論熱點，「微博一轉，圍觀一萬；反腐一動，倒下一片」，微博已然成為輿論監督的利器。

微博的輿論監督作用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3月26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談及微博時代政務公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時強調：「現在社會已經是一個透明度很高的社會，我國微博的用戶有數以億計」，「我們要及時公開相關資訊，主動讓人民群眾瞭解真實情況，接受人民群眾和媒體的監督。」

目前在新浪微博上，出現了一些諸如以「獨立調查記者」、「著名反腐記者」的認證。微博「自媒體」的曝光平臺與「全民反腐」的呼聲相應，成就了許多擁有大量粉絲的「網路反腐英雄」。例如，擁有40萬粉絲的紀許光（又名「紀智鵬」），微博上的自我介紹是「獨立調查記者。重慶（雷政富）事件、河南洛陽性奴案、武漢飛越瘋人院、記者通緝門事件揭露者。專注於獨家新聞的採集和傳播。」又如，擁有13萬粉絲的公民記者朱瑞峰，創辦的人民監督網「已監督曝光了38名廳級以上活老虎高官、32名處級以下幹部。」以上兩位「微博紅人」，正是曝光和搬倒被稱為「雷冠希」的雷政富的關鍵人物。

（四）微博是對公共領域的建構

在筆者所作的一個德爾菲（Delphi）專家問卷調查中，接受諮詢的中美英專家們同意：當前中國尚缺少一個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媒體。微博是當下中國具

有一定「公共領域」潛質的媒體。其潛質表現於「草根媒體」特性、討論話題的廣泛性、及時性和對民眾表達權的張揚。

在擁有超過5億註冊用戶的中國最大社會化網路平臺—新浪微博上，日均活躍用戶達2700萬，活躍用戶日均使用超過90分鐘，每日博文發佈量達1億條。⁴根據2013年4月發布的《2013年第一季度新浪政務微博報告》，2013年「兩會」前後，700多萬微博網友以「微博看兩會」、「我的兩會提案」、「兩會好聲音」、「我給兩會捎句話」等為熱門話題關鍵字發表相關微博，提及「兩會」、「房價」、「稅收」、「環境」、「收入」、「養老」等國計民生熱詞達到92729469次。

北京大學學者胡泳指出，「微博本身雖然無法傳遞太複雜的訊息，透過微博快速傳播即時新聞和評論，加上視頻和圖片的轉發，卻為中國建立了公共的資訊和討論平臺」⁵。

在微博這個「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的公共平臺上，每天都上演著文化衝突與交融的「文化奇觀」—官員和抗議者在這裡對峙；公知和左派在這裡「約架」；同性戀和異性戀者在這裡叫板；「求虐」者和「施虐」者在這裡遂願；中國駐外機構和外國駐華使館在這裡相遇；政府官員與民眾在這裡對話……士農工商乃至魯迅筆下的「引車賣漿之流」都可以發佈個性化的資訊和觀點，分享與評論他人的意見，從而有效地張揚了人民的表達權，促進了約瑟夫·畢塞特（Joseph M. Bessette）提出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有了官、民、民間意見領袖的網上拉鋸，彼此的邊界、關係都將持續轉變，互聯網為政治改革注入動力，推進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作用也由此得到彰顯。」⁶

[-] 王君超

北京清華-日經傳媒研究所研究員、專欄作家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基於微博的表達權與「理想的傳播情景」》和牛津大學OII同名訪問研究項目支持）

⁴ 佟力強總編：《首都互聯網發展報告·2012》，第127頁，人民出版社，2012

⁵ <http://www.dw.de/公民社會在逐漸改變中國/a-16794314>

⁶ 韓詠：《新疆暴亂 微博爆紅》：<http://www.zaobao.com/special/feature/pages/feature090712.shtml>

獨立媒體 分進合擊 競合大眾媒體

台灣新聞專業處境日益艱難。黨同伐異、炒作八卦、置入行銷，侵蝕專業根基；蔡衍明擁有的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要購併有線電視系統，黎智英一度決定將《蘋果日報》、《壹週刊》、壹電視賣給蔡衍明等巨富，更引發媒體壟斷疑慮。憂心新聞前景的公眾，展開搶救專業行動，其中有數路人馬計畫籌募資金、創辦新報來撥亂反正。

我曾任報社編輯，現任大學新聞傳播系教師，對媒體亂象痛心疾首，為此投入獨立媒體運動，去年六月更和獨媒同志共同發起獨立媒體學院，培訓具有獨立精神的專業記者。獨立媒體學院發起人敬佩籌辦新報的勇氣，但認為耗費鉅資辦報，恐將掉入與財團拚財力的窘境。

我們幾經討論，決定另闢蹊徑：先培訓更多獨立記者、育成更多獨立媒體，再分進合擊，聚合成獨媒聯盟，以群體力量挑戰財團霸權。我們立即付諸行動，將原本非正式運作的獨立媒體學院組織化，向政府申請成立正式的社團法人組織，同時開課培訓新秀、募款育成新媒體，並且搭建獨媒的對話和合作平台，一步步實踐我們的願景。

獨立媒體學院的願景，來自我們這些發起人的實踐經驗，以及我們對獨立媒體發展脈絡的分析。



獨立媒體 能量驚人

獨立媒體 (independent media) 一又稱公民媒體 (citizen media)、另類媒體 (alternative media) 一是獨立於政經勢力之外，為基層民眾發聲的媒介。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當大眾媒體依附政經權貴、背棄社會責任，民眾就會運用當時當地的簡便工具，打造自己的媒體、發送草根的訊息，來對抗大眾媒體、爭取民主人權。在網路普及前，台灣民眾用異議雜誌、社運影帶、地下電台來揭露真相；在網路普及後，用部落格、社交網站、網路影音平台等工具來傳播訊息和觀點。

網路時代的獨立媒體百家爭鳴，包括團隊媒體、個人媒體、聚合平台。團隊媒體，如報導社運的《苦勞網》、深耕生態的《環境資訊中心》、監督災後重建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聚焦農業的《上下游新聞市集》、重視媒體改革的《新頭殼》、服務移民移工的《四方報》；個人媒體，如專注環保的朱淑娟、關懷弱勢的江一豪、關注社運的鄭國威、調查疫情的李惠仁、探討教育的彭明輝、反對置入性行銷的黃哲斌；聚合平台，如擁有近七千個部落格的《PeoPo公民新聞》，這些部落格大多是社會行動者和非營利組織創立。

這些積極報導的團隊媒體、個人媒體、聚合平台，以及更多即興書寫的網路寫手，形成一個分進合擊的獨立媒體體系，在許多重大議題上填補大眾媒體的疏漏、引導大眾媒體的走向、抗衡大眾媒體的觀點，進而影響社會輿論、衝擊政府決策。

二〇〇七年台北縣政府為了蓋捷運，強令痲瘋病友搬遷，二〇一〇年苗栗縣政府為了擴大科學園區，強制徵收農民土地，二〇一二年台北市政府為了推動都市更新，強拆拒絕都更的民宅，大眾媒體原本都漠視不報，直到獨媒探討、網民熱議、民怨沸騰後，大眾媒體才跟進報導、政府才正視異議。

二〇一〇年《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辭職揭發政府收買媒體、置入行銷的內幕，二〇一一年獨立記者李惠仁完成耗時六年的紀錄

片，揭露政府掩蓋的禽流感疫情，絕大多數大眾媒體也都視而不見、匿而不報，黃哲斌、李惠仁藉由網路和獨立媒體突破封鎖，拆穿謊言、形成輿論，才迫使立法院修法禁止政府置入行銷、農委會承認確有疫情。

二〇一一年，馬英九總統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到彰化建廠，獨立媒體也扮演重要角色。早在二〇〇八年二月，朱淑娟就開始報導國光石化設廠爭議，成為反對運動資訊來源，《環境資訊中心》、《新頭殼》也加入報導行列；他們的報導與各界抗爭力量相加相乘，終於迫使這個投資規模六千多億台幣的開發案喊停。

獨立媒體，不僅影響力日增，也贏得越來越多專業肯定。《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四方報》先後贏得卓越新聞獎的社會公器獎，《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贏得雲豹新聞獎的評審團獎、《上下游新聞市集》贏得學學獎的影響力獎；黃哲斌榮獲思恆獎、李惠仁贏得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朱淑娟更在二〇一一年一人獨得卓越新聞獎和曾虛白公共服務獎三大獎項。

這些獎項和事功證明，獨立媒體規模雖小，但傳播能量驚人。而且，獨立媒體仰賴的是熱情、專業，而非資金、設備，只要有心就能投入、只要有足以溫飽的收入就能持續營運。獨立媒體學院因此認為，與其耗費鉅資創辦新報，不如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經費來培養獨立記者、育成獨立媒體。

培育新秀 整合戰力

獨立媒體學院發起人包括上述個人媒體朱淑娟、黃哲斌，團隊媒體《上下游新聞市集》成員馮小非、汪文豪，與獨立媒體密切合作的公共電視製作人柯金源、于立平，以及參與創辦《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的我。我們的實踐經驗，見證了獨立媒體的能量，也反思獨立媒體的不足。

我們意識到，台灣獨立媒體儘管日受肯定但仍有四點侷限：首先，發展不夠全面，在環境、農業、勞工等領域卓然有成，但在政治、

經濟、醫藥、體育等領域卻缺乏耕耘；其次，欠缺教育機制，獨立記者難以得到培訓和進修機會；第三，欠缺經費福利，難以支撐獨立記者長期奮鬥，甚至連基本的勞健保都成問題；第四，欠缺協調整合，戰力分散，難以相加相乘。

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團隊伸出援手、協助獨立媒體健全發展。二〇〇七年成立的《PeoPo 公民新聞》平台長期在台灣各地舉辦工作坊，並在網站上提供入門教材；二〇一一年底創辦的《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製平台》，讓獨立記者能藉此平台向公眾募資，取得採訪報導所需經費；二〇一二年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姊妹組織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為包含獨立記者在內的所有新聞工作者爭取勞動權益。

獨立媒體學院不重複上述團隊在做的事，轉而投入與他們互補的工作。PeoPo 偏重初階訓練、weReport 側重個案募資、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服務所有記者而非針對獨立記者，獨立媒體學院因此將工作重心放在與他們互補的四個面向上：進階教育訓練、獨媒社群對話、獨媒創業育成、搭建整合平台。

一、進階教育訓練

獨立媒體學院的教學採師徒制，學員先上六至十二堂概論課，然後提報採訪計畫，接受業師三個月指導，完成並發表報導作品。去年六月第一次招生，培訓廿五位環境和農業領域記者，今年三月第二次招生，開設環境、農業進階課程，並且新開司法、財經、網路編輯課，每個領域招收二十至廿五人。未來計畫每半年開課一次，逐步新增政治、醫藥、體育、科技、影視、國際新聞等課程，為更多領域培育新血。

所有課程的老師和業師都是獨立媒體人、具有獨立精神的傳統媒體記者、參與社會改革的學者；學員多數是非營利組織成員、社會運動參與者、新聞傳播系所學生，也有幾位是現職或離職的報章雜誌記者。第一期學員在課程結束後，約有三分之一繼續從事報導工作，其

中一位贏得PeoPo公民新聞獎，更有一位加入《上下游新聞市集》成為全職的獨立記者。

此外，學院網站 (<http://www.indiamedia.tw>) 開闢「數位學堂」專區，將課程內容陸續上網，並且分享國內外有關獨立媒體的教材和影片，提供學員和民眾線上學習的機會。

二、獨媒社群對話

獨立媒體學院除了培訓新秀，也積極促進獨媒工作者的相互認識和合作。

獨媒報導社會議題，卻很少報導自己。學院網站因此開闢「獨立媒體／人專訪」專區，訪談老牌獨立媒體《苦勞網》、《新頭殼》，也採訪新興獨立媒體《攝影之聲》、《台灣社會事件



信息圖表》、《行南》、《鐵道青年》，以及實地耕耘韓國新聞的新銳記者楊虔豪等人，讓獨立媒體人能夠相互了解，進而合作。

學院並且計畫在今年六月舉辦「獨立媒體高峰會」，邀集獨媒負責人一起分享經驗、探討共同的問題和對策；未來，也將不定期舉行相關對話活動。

三、獨媒創業育成

如前所述，台灣獨立媒體在環境、農業、勞工等領域卓然有成，其他領域還有待發展。學院因此一面開課培訓各領域獨立記者，一面籌建獨立媒體創業育成平台，希望協助更多新秀在尚待開發的領域創辦媒體。

獨媒育成平台正在籌募資金、研擬辦法，目前的規劃是：每年舉辦一到兩次公開徵選，受理新創獨立媒體提案申請，邀請專業人士進行評選，獲選者每月給予台幣五萬元補助，原則上補助一年，最多延長半年，延長期補助減為三萬元。資金補助外，學院也將提供獨媒營運模式和網站建置的建議，幫助新獨媒儘快站穩腳步。

四、搭建整合平台

為了整合報導能量，獨立媒體學院也計畫建構獨媒新聞平台，匯聚所有獨媒的報導，就像 Yahoo! 新聞平台匯集傳統媒體報導一樣。

獨媒新聞平台計畫分為三層，底層是各個獨媒的專屬頻道，或連結到各獨媒的網站；中間層將各個獨媒的報導重新歸類組合，例如分為政治、經濟、人權、環境、農業等類；最高層聚焦報導，例如若有多個獨媒同樣報導強徵農地事件，就將相關報導彙整成一個專題，並由學院邀請相關獨立記者對此議題進行調查報導、深度分析。

既競又合 共創新局

獨立媒體的發展，源自對大眾媒體依附政商的不滿、對新聞專業沉淪的憂慮，但獨媒不必然與大眾媒體對抗，反倒希望以自己開拓的新報導領域、新採寫方法、新營運模式來引導大眾媒體回歸專業、再創新局。例如，朱淑娟旁聽傳統記者忽略的環境影響評估會議，發掘許多重大新聞，就引導傳統記者跟進旁聽。

獨立媒體也樂意成為大眾媒體轉型再生的合作夥伴。例如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長期和朱淑娟合製專題報導、《商業周刊》更曾邀請朱淑娟幫它撰寫封面故事；再如 Yahoo! 奇摩新聞曾經轉載《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的報導，更將《環境資訊中心》和《新頭殼》列為長期合作媒體；又如《天下雜誌》網路版邀請黃哲斌和《四方報》總編輯張正開闢專欄；此外，《上下游新聞市集》揭發多數米粉不含米的調查報導，《聯合新聞網》也在第一時間同步刊登。

總之，獨立媒體學院推動的分進合擊策略，不只是獨立媒體的分進合擊，更是獨立媒體與大眾媒體的分進合擊，期待獨立媒體與大眾媒體既競爭又合作，相輔相成、共存共榮，共同開創新聞專業的新局。

[-]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獨立媒體學院共同發起人

荒謬的國度——內地採訪的慨嘆

沒想過自己一連兩個月都要前往內地採訪，在北京採訪兩會是預先規劃的，採訪四川雅安地震是毫無準備地出發。每次採訪完成，一些 soundbites 總會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之中，過去一直未有機會整理思緒，或許藉著這次分享來一次總結吧！

著名法學家江平：「習近平講共產黨應該永遠接受很尖銳的批評，既然能接受批評，我覺得習近平應以保外就醫處理劉曉波事件，對新領導是很好的姿態。」

沒想過香港記者遇襲竟成為兩會採訪另一焦點，政客所說什麼入鄉隨俗，傳媒一齊策劃衝擊，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一名香港市民在北京採訪異見人士劉曉波太太劉霞，涉及中國人權問題，難道不值得關注嗎？

基於專訪江平教授也主動提出釋放劉曉波，我們決定前往採訪，豈料採訪開始大約十分鐘，楊匡仍在屋苑外跟警衛對話，突然出現數名不明身分大漢從屋苑走出來，他們一手推開楊匡後，似有計劃地集中驅趕記者，並針對三名電視台攝影師，用手遮掩鏡頭，指罵及喝令他們停止拍攝，有記者嘗試拿出手機拍攝，亦被推開。本台攝影師成為首個襲擊目標，他們拍打攝影機，抽起攝影師的衣領，這一刻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有大聲喝止他們。經過一番推撞後，他們轉移目標至另外兩間電視台攝影師，亦正是市民在新聞片段所見的情況。

至今行兇者仍未落網，但有報道指派出所為受傷攝影師錄取口供時竟說記者阻塞通道，犯錯在先。他們想出這點子也不用感到意外，這亦令我想起是次採訪一名維權律師丁家喜，他在二月底跟幾名維權人士在街上派傳單，呼籲民眾參與網上聯署要求部級以上官員公開財產，結果兩會前夕被公安以涉嫌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扣留 22 小時，列入被監控名單。如何界定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呢？警官這樣對他說：「你站在那兒，別人就得繞著你走，所以就妨礙秩序了。」由此可見，以此邏輯執法，記者受襲事件只會不斷發生。

始料不及的是，一個月後再次踏足內地，採訪四川雅安地震。說實話，自己沒有災區採訪的經驗，平日又沒有操練體能，一想到可能要徒步進入災區，面對餘震、泥石流及塌方，實在有點憂慮。不過，這些念頭只是在腦海一下子閃過，時間太緊迫，整個下午忙著訂機票、準備傳片器材及露營物品等，列印幾張地圖後，便趕回家中執拾行李。

我、黃宇深及攝影師陳權威在 4 月 21 日



下午到達成都，便前往新聞中心辦理記者證，新聞辦人員告知前往震央蘆山縣城已實施封路措施，只准許救援車輛通過，否則只有徒步前往。

故此，我們當下決定添置裝備後，在 22 日清晨租車前往蘆山，希望早上路面交通暢行無阻，警方或會放行。可是，在雅安市通往蘆山的路段，原來警方已設下路障，即使我向警方出示記者證要求放行，得到的回覆是我們要前往公安局辦理通行證，這樣一去可能折騰半天也未必批准，惟有死纏爛打，最終他們叫我待在路邊等待上級決定。正因如此，我遇上第一個受訪者程國淑女士，警察問我可否幫忙送她回蘆山，我當然立即答應，這是義不容辭的事，而且也表示批准我們可以進入災區。

程女士住在龍門鄉五星村，她到成都辦事，豈料發生地震後封路，未能即時回家，又聯絡不上丈夫及兩個兒子，一上車她傷心地說聽聞龍門鄉死了三十多人，我只有安撫她不要擔心，並承諾會送她回家。不過，由於要趕及處理「左右紅藍綠」節目的現場報道，當時手持四部手機及衛星電話都接收不到訊息，只好把車停下來，先在路邊找尋可以通訊的地方，同時又出現一批災民們團團包圍著我



們，要求先報道他們的苦況。完成電話報道後，我不想讓他們失望，只好把他們的聯繫方法留下，並告知必須趕快送程女士回家。

沿途的建築物損毀嚴重，蘆山縣城內有改路措施，時有堵車，程女士數次打算下車步行回家，但被我們勸說留下來，因為餘震隨時發生，她還要揹著兩大袋行李，實在生怕她發生意外。當時我的心情同樣矛盾，她的家人生死未卜，倘若出了事，採訪工作應怎樣處理，如何減低對受訪者造成傷害，幸而程女士找回家人，除了她的爸爸頭部受傷入院，丈夫和兒子亦趕及在地震一刻跑到田地躲避。這亦令我們鬆一口氣，也見證著她與家人重聚的一刻。

由於在蘆山縣城的電力逐漸恢復正常，間中可透過電話收發訊息，故此我們每次進入災區都會預留時間趕回蘆山露營，也要尋找電源為攝影器材充電。採訪工作當然不是就此結束，晚上我們會跟災民坐在一起聊天，了解當地救援情況，並從中思索採訪角度。

在聊天過程中，我們因而找到另一個案劉琮女士。她花了大半生的積蓄買下安樂窩，現在呆坐在帳篷內，看著對面滿佈裂痕的新房子，欲哭無淚，事實上汶川地震後才建成的屋子，政府已重新修訂《建築抗震設計規範》，



為何不能再居住，當中出了什麼問題，啟發我們想追尋答案。起初劉琮不願意接受訪問，身體亦因壓力出現紅

疹，或許我是女生的關係，較容易打開話匣子，當前一刻，她最需要的是一個傾訴對象，我跟她睡在同一帳篷，聆聽她的故事，婚姻失敗跟一歲兒子分開、用了十年在北京打拼才買到新房子等，慢慢建立關係，才得以完成採訪工作。事實上，相遇也是一種緣份，我們也並非單單做了採訪便作罷，近日剛收到劉女士的電郵，她終於可以上網，紅疹已逐漸痊癒，重新開展生活。這個消息亦對攝製隊來說，是在這次採訪收到最珍貴的禮物。

汶川地震至今未獲安置災民余正華：「地震並不可怕，怕的是貪官，利用這個機會又撈一筆。」

在內地採訪受到地方官員阻撓，已不是新鮮事。我們在災區採訪尚算順利，但在成都市永興鎮明水村採訪汶川地震後未獲安置的家庭，地方官員聞訊入村，一直在遠處監視，又把受訪者丈夫拉走談話，迫使他們不可接受訪問。本來受訪者仍在我們的車子上，準備前往另一拍攝地點，數名地方官員便在村口「恭候」及跟蹤我們，最終我們只好中止採訪。

目前仍然有數以千計的災民前往北京上訪，未獲安置、被強行徵地、安置點變作商業用途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換來的是地方政府阻撓、扣押，甚至毒打。採訪期間，他們對網上發起罷捐行動，以及當時香港立法會討論應否撥款救災，略知一二，亦只得慨嘆捐款不是直接交予災民，根本白捐了。

兩會期間被監控的維權律師丁家喜：「如果你想要未擁有過的東西，就必須做你從未做過的事」。

在這個荒謬的國度，大家已習以為常地看著一齣齣鬧劇不斷上演，國家領導人說「多難興邦」，地方官員卻趁機大發災難財，把自己荷包填滿；國家領導人說「接受人民監督」，劉曉波卻要坐牢，太太劉霞一直軟禁在家中。

跑慣內地新聞的行家總是苦笑，這就是中國。即使如此，當我看到兩會前夕派發傳單而被監控的丁律師戲言不怕打劫，每天上班有警車接載，維權就是為下一代爭取監督政府的權利；揭發豆腐渣工程的維權人士黃琦，決心與弱者同行，每天發布各地維權運動的消息；汶川地震災民不斷上訪北京，即使回家可能被扣押、毆打，仍然堅持控訴地方政府以救災為名強行徵地，我總覺得只要喚起更多公民覺醒，必定可以迫使中國多走一步。

[->] 劉振瑛
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

蘆山地震採訪手記

雅安地震當日原本是假期，我睡至日上三竿被採主的來電喚醒，告知四川發生大地震，並要求立即起行。採訪過五年前汶川地震，再聽到「四川」與「地震」，總令人不寒而慄、神經緊張，不安驅走了睡魔，我以「九秒九」速度起床收拾行李，腦海不由自主地浮現著一幕又一幕汶川大地震的景象，那些慘不忍睹的情境會否再出現？會否再有學校倒塌？山泥傾瀉、斷橋斷路會否再令災區斷水斷糧？我帶著一大堆問號啟程前往災區。

爭取時間趕赴災區

公司安排我與另一名同事陳樂謙同赴災區採訪，而當時已有另一隊原本採訪汶川地震五周年的採訪隊在四川，他們即時趕往災區。我們為了爭取時間，決定到較多內陸航班的深圳機場乘飛機到四川，但地震後成都的雙流機場一度關閉，積壓下來的航班在「排長龍」，所有往四川的航班都延誤最少四小時。我們雖在機場成功買到機票，但到禁區候機室才發現航班起飛無期，唯有返回大堂的售票櫃檯轉機票，最終，這班機不負眾望成功於晚上起飛。

離震央百多公里的成都，在這次地震中影響不大，我們逗留了兩天採訪接收危重傷者的華西醫院及官方的三場記者會後，便趕赴地震重災區之一蘆山縣城與另一隊採訪隊匯合，我在想，真正的災區採訪工作才正式開始。

為趕及午間新聞前發回報道，我們一早出發，前往蘆山的路上，起初車流極為稀少，只見運送救援物資車輛，當去到蘆山縣城二十多公里外，就開始出現綿延車龍，原來公安在公路設檢查站，阻擋非緊急及救援車輛進入，即使運送物資的車都被迫堵在路上。



這種情景與五年前汶川地震一樣，唯一辦法就是說服公安開路，第一次不讓進，但我們不放棄再試多次，經過一番唇舌，糾纏近半小時，公安也許被我們鍥而不捨的精神，或巧言令色感動了，竟然奇蹟地放行，碰巧遇上的另一隊被拒進入的香

港行家，我抹一額汗，車子長驅直進震央蘆山。

但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越深入災區，路途越崎嶇。由蘆山往寶興的路上，原本狹窄的山路滿佈山泥傾瀉留下的沙石，左邊是山坡，右邊是山崖，餘震加上有雨的天氣，山泥傾瀉隨時一觸再發。由於晚上封路，進入寶興縣的車輛，只好停在有山泥傾瀉危險的山坡路段過夜等候，我們也不例外，幸好晚上沒有餘震及大雨，清晨路段重開，大家平安無恙。

災難當前彰顯人性

猶記得零八年汶川地震時到北川採訪，從山上俯瞰北川縣城，滿目瘡痍，全部樓房東歪西倒，瓦礫砌成一個個大山丘，城內滿佈仍未處理的屍體，那份死寂與滄涼，畢生難忘。相比之下，今次到蘆山及寶興縣，損毀情況沒有想像中嚴重，大部分樓房並無倒塌，但樓房的牆身裂痕處處，災民也不敢回家。即使是汶川地震後興建的樓房亦出現多處裂紋。香港援建的蘆山縣初級中學地下大堂的牆身批盪大幅剝落，背後的磚牆都爆開了，建築時用的「空心磚」也無所遁形。學校校長周紹義整日就待在大樓正門對出的一個帳篷，他凝視著大樓，眼神帶著無奈，可幸的是，樓房並沒有塌下，校長說，仍有信心教學樓經維修後可以繼續使用。

蘆山縣城內主要有兩個安置點，大批災民架起帳篷棲身，但帳篷供應不足，有災民自行搭建大帳篷，五個家庭共二十多人就擠在一個只有二百呎的空間，下雨時更出現漏水。縣城的情況尚且如此，縣城外的鄉郊地區情況更差。有來自鄉村的災民指，震後幾日除了獲發六盒紙包奶及每人每日一枝樽裝水外，便沒有其他物資。

在縣城的安置點認識了袁小姐，當時她與丈夫輪候奶粉配給，由於供應有限，最終只獲發



一杯奶粉。與她傾談才知道，若不是她今天到縣城看醫生，也不知道這裏有奶粉配給。她說離縣城幾公里外的青仁鄉，那裡便有很多嬰幼兒，這幾天都在捱餓，而且不斷哭叫嚷著：「媽媽，我餓了」。說到這裡，袁小姐也哭成淚人。剛握著那杯奶粉的她說，要盡快回去將僅有的這杯奶粉溝稀，盡量讓多些孩子有奶喝。我們也決定跟她回鄉看看，的確發現鄉郊房屋損毀情況明顯較嚴重。她一家住的樓房，上層整幅外牆塌下，幸好一家人仍然齊齊整整。她們與鄰居等共七、八十人，就棲身在自行搭建的同一個大帳篷，食物是共享的，但在沒有供應的情況下，似乎撐不了多久。而且她們缺乏往縣城的交通工具。我們離開時，就順道接載了兩名災民到縣城，她們同樣都是為孩子補給必需品的。在車上，其中一名災民激動到哭了，又說今次真的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我在想，這條村可能真的被人遺忘了。



其實，寶興縣的物資也嚴重短缺，在縣城的一個最大安置點，遇上一對同樣來自鄉郊，同樣得不到物資供應的父子，他們一家廿多口亦已耗盡糧食，家中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祖母。兩父子專程到安置站希望帶些食物回去，但現場工作人員似乎無動於衷：「這些物資只供給我們這個安置點，別的地方由別的安置點負責」。這對父子堅持不走，開始與他們理論。我見狀於是上前查問，並打算訪問這對父子，一名政府人員見到記者，也迅速走過來，主動上前跟我解釋情況。圍觀的人愈來愈多，其他不滿的災民亦開始你一言我一語。這時，事情突然有了轉機，工作人員叫兩父子走上



前，並向他們遞上兩大箱杯麵，剎那間，那對父子走了，聚集的人也散開了。反而在當局眼中，似乎記者比災民更重要，例如分發食物時，除了官兵及工作人員優先，就會輪到記者，拿著採訪證亦能獲發食物。諷刺的是，雖然安置站的災民只有自己帶來的食物，但他們仍然毫不吝嗇、守望相助，除了與其他家庭共享僅餘食物，不少人更願意邀請餓著肚子的陌生人與他們一同吃飯，我也被邀請好幾次，的確災難當前，特別能彰顯人性的光輝。

災後生活真正考驗

除了缺水缺糧，災區面對另一個最大挑戰就是電力供應。地震後重災區的公用電力，包括街燈等設施很快恢復，但仍不能滿足災民的用電需求。舉個例子，與五年前汶川地震比較，用智能手機的人大增，臨時的充電位置全日都擠滿災民，一個拖板再加插另一個拖板，如此類推，一個電掣就插上幾十個插頭，結果嚴重分薄電源，令充電時間比正常多花兩三倍，這種情景五年前汶川地震絕無出現。這亦



令在災區採訪的記者大傷腦筋，因為所用的錄音機、電腦、攝影機、電話通通都要不斷充電，所以每天除了安排採訪工作，必須預留「充電」的時間。

當然，器材要充電，身體更要充電，回想六天的採訪，與同事一起「搏殺」，休息時間欠奉，我們都只能靠意志堅持著。有災民對我們說，來採訪的記者很辛苦，說實話，我不以為然。我想，過了一段時間，救災結束，我們便能離開災區，返回舒適的香港，但這裏的災民則要繼續面對災後生活，對他們而言，仍有漫長的路要走，可能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 周文泰
香港電台新聞部記者

新媒體時代的公民抗爭

書名：《出大事了——
新媒體時代的突發公共事件與公民行動》

主編：陳婉瑩、錢鋼

出版：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2013年2月



胡溫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公共事件頻發。而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興起，使信息的傳播渠道多樣化，不必再單純依賴傳統媒介。政府處理突發事件慣用的「捂蓋子」手法，在信息高速流通的當下已難奏效。漸漸意識到新媒體力量的公民們，與當局展開了「控制」與「反控制」的拉鋸戰。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最近出版的新書《出大事了——新媒體時代突發公共事件與公民行動》，是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系列叢書之一。該書由陳婉瑩、錢鋼主編，是翟明磊繼《中國猛博》之後的第二本著作。全書以行動為核心，時間為序，記錄下胡溫十年中國十七起標誌性公共事件的傳播實況，展現了新媒體時代中國公民意識覺醒、公民社會成長的大勢。

2003年非典在廣東爆發時，政府下達「嚴格做好保密工作」的通知，控制信息傳播，導致疫情失控，感染人數呈幾何級數上升。彼時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率不高，這種傳統的新聞管制方式仍然奏效。到2008年四川大地震，校舍倒塌導致五千多名孩子死亡，媒體的報導在中宣部三道禁令的壓力下很快停止。但在網絡上，一些質疑校舍建築質量的帖子開始瘋傳，引發網民對政府的批評。禁令在網絡時

代已經難以禁止真相的傳播。一批公民調查者也主動站了出來，填補傳統媒體缺席造成的空白。之後的郭寶峰案、番禺反垃圾焚燒運動、李莊案中，網絡、微博等社交媒體一再成為雙方博弈的主戰場。

作者文筆感性，筆端常流露感情。事實上在《中國猛博》之後，翟明磊和多位受訪者成為朋友，參與、推動多宗公民事件：翟是國內最早關注陳光誠事件的公民記者，不但將維權界的朋友介紹給陳光誠，而且在陳被抓坐牢後，參與營救捐款。最後，陳光誠在駱家輝大使護送下走出使館，第一個對外的電話就是打給翟明磊。

作為參與式寫作的成果，本書寫作過程也是一次公民行動：不斷被阻撓，不斷被干擾，不斷地堅持，不斷地記錄。正如作者筆下正在形成的中國公民社會。

王睿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Adventures in Skype: University without Walls

The experiment started over the summer. At a journalism confab in Las Vegas I met Ava Greenwell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s Medill School of Journalism.

We hit it off. Ava and I were both full-time faculty pursuing our PhDs, and before moving into academia we had long careers in the newsroom. We discussed ways that we could collaborate across time zones.

The conversation had a familiar ring. Finding ways to connect via continents had become second nature to me. Since relocating to Hong Kong in 2010, social media helped me keep in touch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overseas. To be sure, I had reaped the benefits of staying connected Facebook, Twitter, and Skype, but never imagined that such tools could also transform learning and teaching.

If new technologies could keep friendships thriving from afar, who was to say it couldn't work its same magic in the classroom?

Taking the Plunge

In the fall Ava and I wove in the Skype exchange in our existing course outlines to find a crossroad.

In many ways my course Mobile Journalism – launched in Fall 2012 --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Students shoot stories and edit them via the smartphone. Ava's class was a traditional broadcast class, but we agreed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learn a lot by sharing about these different news gathering platforms.

Of course in any new adventure, there is the wild card. Technology was the bridge in this experiment, but also the element of uncertainty. I tapped Howson Tsang the head of our broadcast studio, and a tech-savvy student Raymond for the technical team. We set "Skype test" da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new semester. The connection was crisp and clear, not a crackle or blip in 45 minutes. Now fingers crossed for the start of the semester.

Compromise Across Time Zones

My students, all of them natives of Hong Kong, were still at sphinxes when I told them about the special exchange.

"We have a very special exchange via Skype with the

students at Northwestern..." I said. I was disconcerted with their blank stares. Did they understand what I was saying? I repeated myself again. "We have a very special exchange via Skype with the students at Northwestern..." I saw a smile or two when I told them that these students were also journalism majors. I found myself explaining at length about the time zone differences saying, "9am here is 7pm there or 10am here is 8pm there," I found myself repeating like a mantra.

Time zone differences became a major part of the experiment.

Given our 14-hour difference successful exchange was only possible with give and take from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va's class agreed to stay an extra hour from 8-9pm while my class would come in an hour earlier at 9am rather than 10am.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some students Googled Northwestern, Medill and Chicago and diversity in America. A good sign. An open-mind and curiosity were essential elements of success.

Culture Shock

Our first session was in the broadcast studio. All 21 students arrived on time. The technical team had set everything up the day before. It was a favorable Skype day. We could see Ava's class clearly and vice versa. The challenge at the start was finding a format for the discussions. I quickly discovered that it worked best when Ava and I ignited the discussions with questions.

Once the students beca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format of the class – passing the microphone to each other to share -- the discussions were eye-opening.

One of the first discussions was about "diversity" in the context of news coverage and the newsroom. This concept of diversity was foreign to the students and to the media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My students tended to view diversity, especially ethnic diversity, more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ers vs. Mainlanders. Still while our definitions of diversity differed,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take that topic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about culture, journalism and the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ir respected countries.

As part of our exchange we had the students swap projects and critique each other. The students swiftly posted their stories online via YouTube or Vimeo for the critique .

By the look of their expressions and the vibe of the class, I noticed how attentive my students were when receiving feedback from the Medill students. A few proactively amended their projects per the feedback.

“I think the critique part is very useful for both of students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hue Yan because we can receive comprehensive feedback from both teachers and audience overseas. Not only did the participants give comments on the video projects, but they also provide useful and practicable technical suggestions,” a student wrote.

Over the course of our three Skype sessions, I saw my students become more interactive. The blank stares had disappeared. A few of the students told me that the liveliness and openness of the American students was infectiou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also speak up.

They now knew many of the Medill students by name. They commented at how diverse the class was, and how classes in the U.S. seemed more lively and interactive. It left me wondering if distance – just enough because of the TV screen in between and the fragile yet incredibly powerful Internet connection – gave them the confidence to be themselves. I thought about teenagers who chat freely on IM or hide behind an avatar on Facebook. Maybe Skype in some ways provided a safe haven.

Given that our University doesn't have study abroad programs, numerous students told me that it was the closest thing to such a program they would have. I saw a common theme in their feedback. They wanted more exchanges. They wanted the Medill students to visit. They wanted to visit the U.S.

One student wrote: “As we all know technology is definitely our future...this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in my school career. Before that, I seldom used Skype as a tool to chat with others, it is not even installed in my computer, but now I will try to install it and tell others it is a good tool for communication.”

In keeping with the social media spirit, we launched a Facebook group and invited the Medill students to join. I



secretly hoped that it would be a way for the students to stay in touch long after Skype ended.

Upon reflection the exchange taught me that my role was not simply as educator, but as a facilitator. It was in asking questions, in igniting thought and curiosity, ultimately in the hopes that the students would motivate each other to learn. The experiment proved that learning could thrive outside of the traditional routes of tests, and proof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using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 asking questions, in combining culture, syncing time zones, in sharing about media and journalism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keeping an open mind, we had finally arrived at a crossroad. Technology was not only a connection and bridge, but played a role in creat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nversation we shared. The experiment had worked.

In fact, the greatest value seemed to be in the discovery of technology and each other. There were no limits.

“This kind of cultural exchange isn't many people that can think of. Thanks to the technology, Carrying out this kind of exchange requires no more airplanes, nor any leased lines. An ordinary computer, ordinary camera, and a simple Internet connection do the job,” a student reflected.

And the feedback was unanimous, the possibilities certainly now endless.

“I want to do this again,” a student told me after we disconnected the Skype on the last day of the session. “I do too,” I thought replying with a nod and smile. It was a good start.

☞ Amy Wu

Lecture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 chance meeting with Professor Amy Wu of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t the Unity Journalists Convention in the summer of 2012 turned out to be a chance for exploration.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months we talked and tested our plan to have our respective journalism classes participate in three, one-hour-long exchanges via SKYPE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3.

To succeed, our students would need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ach other and something about themselves. We chose video reporting on diversity issues as a lens through which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culture. We accomplished that and more.

When asked to provide their final thoughts about the experiment one student wrote: "I learned how the definition of diversity is different everywhere. We have a definition and fram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Hong Kong,"

In the end, my students produced better final reporting projects than past groups and I think our collaboration was a major factor. Dissecting diversity reporting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forced students to examine the assumptions they held about an audience's background knowledge. My students and I and ca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reality that we really did not know much about Hong Kong. We were lacking historical and local context. However, Prof. Wu and her students helped us make meaning.

The two groups critiqued each other's video stories, providing both positive and critical feedback. There's something about knowing your work will be assessed by someone other than your professor. The need to be understood and provide context takes on a sense of urgency when the reviewer does not live in your country or share your culture.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was not to assume anything," another student wrote. "Specifically with the Hong Kong collaboration we talked about the distinguishing factor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It's easy to generalize, but I'm called to report."

I believe that extra effort spilled over into my students'



final projects. I recorded higher grades among more students that quarter than I had during nearly two decades of teaching. Of course, I cannot absolutely attribute the improvement to this exchange. But it's worth exploring and repeating.

A collaboration like this requires some give and take. Because of the time difference of 14 hours, it was easier for my students to move our class time to the evenings during our Skype sessions. When it was their Tuesday 10 am class time in Hong Kong, it was Monday 8 pm in Evanston, Illinois. Furthermore, we had to factor in our quarter system with their semester system and their Chinese New Year break when we selected dates to collaborate.

We were worried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kype, but it rarely failed. And when it did, it was usually operator error on my part. Though a project such as this one requires extra work, the payoff is worth it for the students and faculty. We are already thinking about how to improve future collaborations.

The farther away from home base, the more likely students will be engaged. But for instructors who are not ready to venture beyond their home country, collaborating with classes in a different region or even a different part of their metropolitan area is an option. Pushing students beyond their comfort level is always the goal. Now that the technology is accessible, we can easily push beyond our borders, too.

✉ Ava Thompson Greenwell

Associate Professor, Medill School of Journalis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關於「新媒體識讀寫」的二三事：

參與學術會議，有點像吃自助餐，要懂得如何切合自己的胃口，作出選擇。連綿的會議日程從早到晚，多所課室和議會廳同時進行多場演說和討論。撇開自己負責的環節必須出席外，其餘時間聽誰分享，大抵而言是一種學科口味、知識嗅覺及研究素養 (research literacy) 相互影響的行為結果。雖然今次在曼谷舉行的學術會議，主題是「定睛在媒體與市場語言帶來的挑戰」，我個人目光的焦點，卻選擇了遊走於東南亞的文化變遷及「新媒體識讀訓練」(new media literacy) 之間。

為什麼，曼谷讓很多學者「給Li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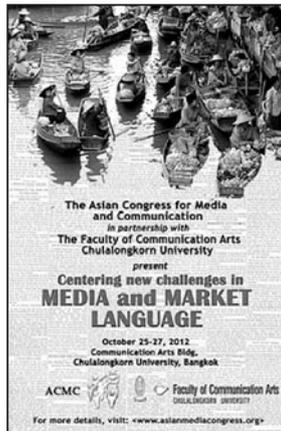
有人開玩笑說，也許開會地點是旅遊城市曼谷，本屆的與會人數特別多。除佔了大多數的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和印度的教授外，也吸引了一些來自新西蘭、澳洲、美國、日本、英國和歐洲等地的學者赴會。

提及東南亞的第二大城市曼谷，浮現在香港人腦際的，可能是富傳統風情的水上市場、設計新穎的巨型購物商場、行不盡的翟道翟週末市集 (JJ Market)，甚或在電視上看到的「千奇百趣」。然而，當二零一二年十月底到了曼谷，我卻無暇往上述旅遊點。從十月廿五至廿七日，我都在朱拉隆功大學的傳播藝術學院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Chula — 「朱拉」(當地人，包括大學師生都喜歡用的簡約稱呼)，除了是泰國公主曾經修讀學位的地方，更是盛產泰國眾多影視明星之處，例如電視俊男 Pong、電視女主角 Peung 和在零九年泰國最賣座電影 Bangkok Traffic Love Story 《輕軌戀曲(下一站說愛你)》中客串的美女 Aff Taksaron 等。兩年一度的媒體傳播亞洲代表議會 (Asian Congress for Media & Communication, ACMC) 學術研討會，這次由朱拉傳播藝術學院協辦，開會地點就是位於「鄉村」區，新落成樓高十一層，

剛使用近一年的傳播藝術大樓。

多謝「朱拉」一位學生導遊大使的介紹，得知座落於帕亞泰大道 (Thanon Phayathai) 兩旁的東、西校園區，在新一代學生的日常交談中，分別被暱稱為「城市」和「鄉村」，因為東校園區一帶看起來很美、很富庶，令人很想搬進去。



知名的廣告研究學者費里斯 (K.T. Frith)，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曾撰文提醒跨國公司要注意東南亞對國際廣告的抗拒問題，特別是這些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對廣告所鼓吹的全球消費意識的厭惡。「文化拉扯至今天，很多商務旅客 (包括一些開學術會議的學者) 都很喜歡曼谷，因為在「朱拉」附近一帶的暹羅區 (Siam)，在東南亞傳統文化的外觀背後，依賴著全球文化而變得很「城市」，即具備了現代西方標準

的方便、舒適及消費愉悅性。

東南亞地區的新媒體文化

雖然身在「城市」的享用國度，不少學者心，惦記的仍是「鄉土」事，特別是兩者之間產生的張力。我們知道在東南亞，新媒體的快速發展以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最為顯著。象徵「全球一市」的社交媒體，驟然間普及起來。它對某些相對處於弱勢和邊緣的地方和族群產生的影響，是複雜和微妙。新媒體全球一「市」，喻表的不單是從停滯、落後的鄉村意象，轉換為快速和不斷流動的「都市」節奏，這市也是「市場」。市場講求的是靈活，是消費方便與回報率的計算。

例如，雖然菲律賓首都大馬尼拉地區有一座「垃圾山」，提醒大家仍有很多貧窮問題。但聽說，已有三分之一菲律賓人口上了網，當中超過九成網民使用 Facebook。特別是廿來歲的菲律賓家庭婦女，她們花在社交網站的時間很多，除了在網上交談、娛樂，更成為長期不斷與海外的家庭成員接觸的既重要又便宜的媒介。有些經濟較差的人會寧願減少其他消費支出，以保證自己可以繼續用手機、用社交網站。

2012媒體與傳播亞洲代表議會後記

當熱門 APP 手機遊戲憤怒鳥 (Angry Bird)，去年春天揀選了在臉書用戶全球人數排第二多的印尼之耶加達舉辦全球發佈慶祝活動，不少傳播學者就醒覺到，與搞公關、市務推廣的傳播界同業相比，我們對東南亞傳播消費市場的認識是慢了幾拍。至今，關於東南亞傳播問題的研究，積累了成果很少，也追不上社會變化的步伐。

然而，有句諺語這樣說：「池塘小不是問題，池塘水不動才是問題。」我參與這次會議感受到，研究人員數目如池水，雖然少，但各人已活躍起來。關於東南亞的新媒體傳播及文化研究，可以豐富我們解讀全球現代性（複數，Global Modernities）的意義。究竟在「數位移動平台」（digital mobile platform）這社會科技發展的主旋律底下，「新媒體樂章」在「全球（在地）化」的現實中，是會怎麼樣「同中有異地」彰顯呢？這是在會議期間常常留心的問題。

新媒體，要識讀又識寫

第二個留心的焦點是，媒體素養教育的新思維。媒體識讀的字面意義，就是認識和解讀媒體的能力，要「識用」和「識分別好壞」。當中，批判是最重要的教育主題。

談批判，我不禁想起，已故的著名社會學者、兼報人成露茜博士編寫的遺作《批判的媒體識讀》（與羅曉南合編，台北正中書局，2005年）。成教授於香港出生，在台灣成長。她於二零一零年初，因癌病逝世。而她曾任教的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格外為她下半旗一天哀悼，紀念她藉媒體、教育和社運為弱勢族群和女性發聲所付的努力和貢獻。作為社長，成露茜給在台灣的東南亞裔移民辦過《四方報》。這報是在台灣出版的泰文、印尼文、菲律賓文、越南文和柬埔寨文報紙型月刊，其內容除了東南亞各國的當地新聞外，也把台灣當地新聞翻譯為各種東南亞語言，以連繫這群來自四方八面的東南亞移民工人。

會議上，有些學者就是關注傳統媒體新聞及網絡力量如何在市民群眾中起作用，即新舊

媒體的政治性和角色差異。不過，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關於新媒體素養教育的「創作」訓練。誠如有些研究員提出，在新媒體時代，識「讀」與識「寫」應重新界定。潛台詞是昔日大眾媒體掌握在少數權力精英手上，批判訓練是為「解放被動的」一般媒體消費者（media consumer）而設想。但今天很多網民都是「媒體產消合一者」（media prosumer），在自製的各式各樣的網頁或社交網站上，他們除了書寫博客式文章，還上載生活照片、惡搞圖片和歌曲、也生產社區錄像、微電影、電台節目…等等。因此，媒體教育的課程，要顧及到新一代媒體使用者也是生產者的角色轉變。「識寫」二字，是針對數碼多媒體創作的「關身性批判」（critical-reflexive）訓練的目標而言。

影音敘事的能力和「關身性批判」訓練

對成長於發達城市的九十後來說，「識寫」與否，不單單是關乎如何製作及管理網頁、如何使用影音器材，諸如這一類的多媒體基礎技術問題。新媒體素養的「寫」作是文字／說話、音樂／音響及影像的共建敘事訓練，而且要在美學修辭上、倫理上、意識型態上「批判地問自己」製作的文本「如何及為何」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文化政治效果或影響，和探討自己想嘗試達到這傳播目的之理由。換言之，新媒體素養在解讀和關心消費過程中的「他人製作文本」（例如好萊塢大電影）之外，同時也要關心「自身製作的文本」（例如上載 YouTube 的微電影及在社交網瘋傳的二次創作惡搞海報）在數碼互動世界中的意義。

回看東南亞國家，假若昔日是老報人用文字為他們報導發聲，是跨國企業用廣告及大電影塑造西方帝國的文化消費模式；今天，當新媒體成為新一代生活的必需品時，在使用文字影音傳播的「識讀寫」培訓上，我們要切實思考，我們希望有怎樣的教育效果呢？和怎樣探討如何能達致這樣的媒體素養目標。盼望學者們，對東南亞地區的關懷，能和全球消費市場與時並進。共勉之。

☞ 葉智仁

香港浸會大學傳播學系副研究員

4月傳媒記事簿

《人民日報》海外版罕有報道泛民意見 《大公報》新聞造假發道歉聲明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三月底就普選特首提出「愛國愛港」及「不對抗中央」兩大底綫，在香港惹起爭議。《人民日報》海外版四月初刊出題為《香港社會熱議喬曉陽「底綫說」》的「特別報道」，罕有地引述多位泛民主派人士駁斥喬曉陽的言論，包括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批評喬言論「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國際標準；報道同時亦提及「佔領中環」運動。此文被中國網、網易、新浪網等轉載，網易轉載時另起標題為〈香港民主黨批評特首選舉篩走中央不歡迎的人〉，刊後截至晚上十時，有近八萬名網民留言。劉慧卿表示歡迎《人民日報》有較全面的報道。但亦有時事評論員認為，個別點名的做法屬罕見，質疑是要以他們的言論來證明他們並非中央眼中的愛國愛港人士。

香港《大公報》四月中報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了解民情乘搭出租車的消息，題為《北京「的哥」：習近平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被內地各大媒體熱烈轉載，網民議論紛紛，新華網傍晚刊出簡訊，稱此報道為虛假新聞。《大公報》稍後也發出道歉聲明。指出由於工作失誤，出現重大虛假消息是極不應該的。因此要誠懇地向讀者致歉。但在新華網確認此報道為虛假前，新華社中國網事官方微博稱：「總書記打出租」確有其事，北京市交通部門和率先報道此事的媒體都向新華社記者表示，確有此事，相關情況都是真實的。



通訊局指王征操控亞視新聞部 壹傳媒售台壹電視予年代集團

多名亞洲電視員工前年撰寫匿名信，向前廣播事務管理局投訴亞視主要投資者王征違規操控亞視。局方去年初步裁定指控成立，向亞視罰款一百萬元，並計劃公開報告。亞視之後成功透過司法覆核，阻止局方公開報告。通訊局方面不滿提出上訴，四月中並在庭上透露王征涉直接干預節目運作，操控新聞部的編輯。亞視與通訊局雙方律師各自陳詞後，上訴庭押後裁決。此外，亞視原訂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繳付電視牌照固定費用，另須於去年十二月一日繳付傳送者牌照費，但亞視未能如期交費，直至該局發出催繳通知和警告信後，亞視才於上月二十五日繳清費用。通訊局指亞視明顯違反牌照法定要求和牌照條件，鑑於其嚴重程度、性質和持續時間，決定向亞視罰款共十萬元。

壹傳媒出售台灣電視業務予年代集團董事長練台生的計畫，雖然中途曾殺出程咬金，但兜兜轉轉仍回到練台生的手上，壹傳媒月中宣佈擬以14億新台幣，折算約3.628億港元，向練台生出售壹電視全部股權及股東貸款，並預期將就建議出售事項錄得虧損約5.228億港元。出售計劃未完成，壹電視內部已有裁員動作，台灣媒體引述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嘉聲的內部聲明，指出「從月中開始，練台生團隊將開始針對各部門主管進行整合面談與盤點」，而各部門主管與人力資源部將於近日與員工聯繫，以完成人力整合相關安排。

繼《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及《太陽報》在四月七日分別加價後，《經濟日報》及《明報》亦於四月十日正式加價一元，新售價同樣為每份七元。這是自二零零零年以來首次有報章集體加價。報章加價後首個上班日，報販協會表示，銷情下跌一至兩成，但相信跟免費報章無關，預計數日後才回升至往日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維基告《信報》誹謗敗訴 港視員工開支大增減慢拍劇

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在二零一零年申請免費電視牌照期間，曾接受《信報》訪問，後來以「王維基批無綫膚淺奇招掀視圈世紀戰」為題刊出，王指他從來沒有批評過無綫電視膚淺，事實上他在訪問中只是道出普遍電子傳媒的新聞報道內容「好淺，不夠深入」。因此報道扭曲了他的意思，令他聲譽受損，四月初在高等法院控告《信報》及其副總編輯誹謗及要求賠償，但拒透露金額。王維基作供時指《信報》無中生有，作為長期讀者，本來認為《信報》值得信賴，才決定接受該報訪問，他擔心事件會導致自己與無綫的關係受損，而且同行如何品評他是否一個正直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他沒有必要得罪人。法庭在二十六日裁定王維基敗訴。判詞指雖然報道標題為「王維基批無綫『膚淺』」有誹謗含意，但縱觀整篇報道內容根本未能支持該說法，不會對王構成誹謗，讀者反而只會對記者或編輯留下不良印象。王維基表示對裁決感失望，會考慮上訴。

等待發牌的香港電視月中公佈出售電訊業務後首次半年業績，截至二月底止已投資 2.02 億元於節目成本上，當中包括期內直接用於節目製作的人才成本資本化及製作經常開支，過去六個月就用了 1.14 億元，其中工資及薪金支出按年急升四倍至 1.05 億元，半年電視業務共蝕去 9,941 萬元。雖然未獲發免費電視牌照，但上半年香港電視仍然錄得 340 萬元收入，主要來自藝員管理服務及牌照費用。而面對發牌的不確定因素，集團表明業務模式將「更為謹慎」，以確保擁有足夠彈藥應付未來挑戰。



碼頭工潮無綫涉嫌新聞審查 新盤失實報道傳媒日後或要負刊責

香港的貨櫃碼頭工人四月初發起罷工行動，工潮持續多天，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無綫王牌新聞節目《新聞透視》，早前曾預告會在十三日晚播放〈碼頭風雲〉，預告內容包括工人苦況、貨櫃業走下坡原因，及社運界加入工潮的影響等；詎料到正式播放時卻臨時被抽起，改播原定於四月下旬播出的雍澄軒分拆酒店事件專輯。據報道，工潮專輯早在半個月前已落實播放，但有新聞部高層在該專輯完成剪接後，才要求負責的監製抽起節目。無綫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回應時強調無綫沒有向新聞部施壓，原因是勞工處介入談判，令工潮有突破性進展，故希望再跟進和充實內容才播出，但暫未定播放日期；他又否認有新聞部同事因此辭職之說（*後按：隨工潮告一段落，專輯終於在五月十一日播出）。另一方面，同樣涉及報道碼頭工潮的資訊節目《東張西望》，被觀眾質疑在報道中偏幫資方 HIT，通訊局因此收到多過千八宗的投訴。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於四月二十九日正式實施，牽涉發放虛假、失實及誤導的廣告或資訊，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五百萬元及監禁七年。除發展商之外，發佈有關資訊的傳媒，亦有機會遭到刑事檢控。政府負責的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專員馮建業會見傳媒時表示，傳媒以後處理「市場消息」時需格外謹慎，若消息構成誤導，亦有機會要負上刑事責任。但馮解釋，法例設有免責辯護條款，只要傳媒能夠證實，所報道的消息來源並不在傳媒，而是由其他人士提供，並且未有作出任何修改，便可以用作為免責辯護理據。有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指出，以往記者即使不慎作出失實報道，亦毋須負上刑責，有關條例實在令人擔心。

【+】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 + + + + + + + + + + + + + + + +]

[+] STRIVING FOR STANDARDISATION OF FORMATS ACROSS ALL PLATFORMS

The challenge is that when a new format is introduced, content producers must accommodate its requirements as well. In a world in which such inventions are common, standards offer a means of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realm of existing content preparation and distribution flows.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April 2013

[+] CONNECTED TV: GROWING OR SLOWING?

Connected TV refers to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Web 2.0 features into TV sets, game consoles and set-top boxes, making them capable of handling interactive media, Internet TV, OTT content and on-demand streaming media. Despite hugely optimistic prediction about the future of connected TV, there are some who are skeptical, saying that surprisingly few consumers are buying it and even fewer are using it, and that broadcasters are much less interested in launching it than they are in other opportunities.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April 2013

[+] BRANDED VIDEO CONTENT – IS IT A WISE STRATEGY?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lines between traditional paid, earned and owned media have blurred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ingly more marketers having to focus more on creating content designed for direct-to-consumer channels and social media outlets. A new breed of “content marketers” has emerged, and brands of all sizes are developing new strategies for engaging with their customers.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April 2013

[+] 2013: YEAR OF THE SECOND-SCREEN APP

When you have lovingly crafted a great TV show,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is your audience to be distracted away from the first screen and onto a second, where they are interacting with someone else’s content. Audio watermarking technology is a key to delivering an engaging second-screen experience. It can als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stracted eyeballs, by directing viewers to apps the broadcaster controls.

BROADCAST

March 22, 2013

[+] WHAT SHAPE COMPETITION IN A BUNDLED SERVICES MARKET?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buying bundles may threaten the viability of single or dual-service provider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ut it could also be the vehicle for true inter-platform competition. Current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principles are challenged by the increase in triple and some quadruple-play service bundles in the market.

INTER-MEDIA

February 2013

[+] IS UBIQUITY IN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OVER-RATED?

Telecom operators, industry bodies and equipment suppliers often praise the “ubiquity” of traditional services, such as the PSTN or SMS, and the universal “reachability” of E.164 telephone numbers. This is contrasted with the “islands” of connectivity represented by Internet-based communications such as Skype or Facebook.

INTER-MEDIA

February 2013